

中国古代文学导论

刘五一 朱占青 王倩 王森林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导论

刘五一 朱占青 王倩 王森林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导论 / 刘五一, 朱占青, 王倩, 王森林
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9

ISBN 7-5348-2454-0

I. 中... II. ①刘...②朱...③王...④王... III.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5898 号

责任编辑:张弦生

责任校对:叶长林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天一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20.5

字数:49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348-2454-0/I·819 **定价:**3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学是人学，反映人的喜怒哀乐。

文学是使人愉悦的东西。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语言艺术。

关于文学这一概念的解释和理解，在当今社会可谓五花八门，也给我们多角度、多层次的了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却经过人们不同的认识理解过程，从文章博学、文章经典、官位职能直到接近现代意义的“文”、“笔”之辨，文论的兴起与演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但文学创作的丰富、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革新的步伐却从未停止，而且愈来愈绚丽多彩。《中国文学导论》一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既借鉴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又试图独辟蹊径，用一种全新的模式和视野来探索中国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本书以三大模块来展开论述，即总论——中国文学全方位的鸟瞰俯视；分论——各大文体的探索研究；例论——各文体典型作品的思想艺术精解。

中国文学的精华应该主要集中在古代，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们研究的着眼点也放在从先秦到清代的古代文学范围，我们对中国文学特色、类别和鉴赏的看法，对诗词、文

赋、戏曲、小说四大类别的论述及例析，既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展开了一些新的视野，我们的探索也许不够深入，或许有一些不足，期望得到各位专家、同仁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黄淮学院中文系教授张红运博士的热情指导，并得到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张弦生编审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全书由刘五一提出纲要和体例安排，并由刘五一、朱占青、王倩、王森林分工撰写，最后由刘五一、朱占青统稿。具体分工如下：

刘五一：总论。例论：诗经、庄子、楚辞、汉赋、曹植。

朱占青：戏曲、小说分论。例论：戏曲、小说各篇、左传。

王倩：文赋分论。例论：李白、杜甫、韩愈、柳永、欧阳修。

王森林：诗词分论。例论：史记、古诗十九首、陶渊明、周邦彦、苏轼。

作 者

目 录

序

总 论.....1

中国文学的特点.....4

中国文学的分类.....15

中国文学的鉴赏.....33

分 论

第一编 诗词论.....43

诗经.....64

屈原和《楚辞》.....112

古诗十九首.....129

曹植的诗.....149

陶渊明的诗.....172

李白的诗.....193

杜甫的诗.....222

周邦彦的词.....245

柳永的词.....265

苏轼的词.....280

第二编 文赋论.....303

左传·····	316
庄子·····	347
司马迁和《史记》·····	356
汉赋及司马相如·····	372
韩愈的散文·····	388
欧阳修的散文·····	402
第三编 戏曲论·····	417
关汉卿的杂剧·····	426
西厢记·····	441
牡丹亭·····	455
长生殿·····	464
桃花扇·····	474
第四编 小说论·····	482
三国演义·····	489
水浒传·····	506
西游记·····	539
金瓶梅·····	551
儒林外史·····	583
聊斋志异·····	609
红楼梦·····	623

总 论

“文学”一词，在先秦就已出现，不过那时的含义是文章博学的意思，文学在当时为孔门四学科之一，《论语·先进》说：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汉朝人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变化。“文学”在当时被认为是文献经典的意思，如《汉书·高帝纪下》：“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同时，“文学”被列为人才的一类，并成为一种官职，《史记·儒林列传》：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一岁皆辄试，能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赧赧多文学之士矣。

这里的“文学”也含有儒学的意思。

汉代在“文学”之外又有“文章”一词，如《汉书·公孙弘传》：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这里的“文章”，应指辞章方面的能力，同现代人们理解的文学之意义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接近。

南朝又有“文”、“笔”之分。刘勰的文体论，有反对当时文风的一面，也有和当时一致之处。当时颜延之提出言、笔、文三分法，不讲文采的经书是言，当指《尚书》、《春秋》；有文采的传记是笔，如《左传》、《礼记》；有文采的韵文是文，如《诗经》。这个三分法认为，笔和文都有文采，接近于文学，言没有文采，不是文学。到了萧统，在《文选序》里提出了两分法，以有文采的为文，把经子史排斥在文外，但对史又区别对待，提出：“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文之综辞采，序述之错比文体，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这反映在南朝时期文学概念的趋向明确。所谓趋向明确，即开始想分别文学与非文学，而萧统提出的标准，含有文学与哲学、史学文的不同。就这方面说，刘勰认为，经书是文，在文学概念的趋向明确上显得不如前两家。但从当时人所谓文来看，即认为有文采的是文，那么颜的三分法比萧的两分法更符合实际。从文论的角度看，刘勰把经子史归入文内，更有利于对文学发展的阐述。

以有韵和无韵区分文和笔代表早期的认识。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说：

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倚藁纷披，宫微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是有韵、无韵的简单的区别。他认为“文”的特点是抒发感情，以情动人，并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具有可供欣赏的价值。“笔”则是奏章之类的应用文。萧绎已经注意到“文”在情思和语言两方面的特点，他所说的“文”已经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可是他的《金楼子》

影响并不大，对中国文体论影响重大的是与之同时的《文心雕龙》和《文选》，而这两部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分“文”和“笔”，它们所列的“文”体，包括了诏、令、檄、移之类应用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选录自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应用文。

在传统目录学里，文学的范围也不很明确。西晋荀勖始创四部分类，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东晋李充把荀勖四部中乙丙两部互换，确立了经、史、子、集的次序。可是目录学所谓“集部”，即不等于萧绎所说的“文”之专集，更不等于今之所谓文学专集。集部书里收入了许多应用文，而小说、戏曲这两种体裁，今人视为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古代却不入集部。小说中的文言小说，或入史部或入子部。白话小说和戏曲，传统目录学则基本不予著录。

总之，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因而，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不得不按照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兼顾古人的习惯，来确定研究对象。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诗歌。包括诗、词等。

第二类：文赋。包括散文、赋等。

第三类：戏曲。包括散曲、杂剧、传奇等。。

第四类：小说。包括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等

本书的总论，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加以考察，即中国文学的特点，中国文学的分期、中国文学的类别、中国文学的区域风格、中国文学的流派、中国文学的学习和欣赏等诸方面进行探讨，分论则从诗歌、文赋、戏曲、小说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各类文学的发展演变状况，为帮助读者对各类作品有更好

的理解和鉴赏，我们在每一分论后附有若干代表性作品的分析和论述，以帮助读者对中国文学有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文学的特点

一 悲剧性

愤怒出诗人，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在反复验证着这样的规律，凡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及伟大的文学家，无不是在逆境或压抑中产生的。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中经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到关汉卿、曹雪芹，同西方的宫廷勾心斗角为主要内容的贵族悲剧不同，我国历史上文学的悲剧性更多地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情感，即使被称为“正声”的《雅》也充满了对昏庸统治者不满的情绪，如《大雅·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再如《小雅·十月之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①刘勰的评论较准确地反映了时代悲剧性的特点。

我国长期以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形成统治者专权专制的特点，这种权力的不可制约性，造成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诗经》中已显端倪，我们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屈原的遭遇更能说明中国文学悲剧性的特点。屈原本楚贵族，与楚王同姓，但因坚持美政理想，改革不良政治，却受到旧势力的围攻，而楚怀王却听信谗言，将其疏远流放，司马迁的话很能说

^①（南朝）刘勰：《文心·时序》，中华书局，1980。

明问题: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中国文人往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踏入人生或仕途。然而他们的“正道直行”往往会带来腐朽势力和既得利益者残酷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屈原这样身份高贵的文人尚不能容，何况他人乎！南朝鲍照“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的诗句很能说明这一点。

司马迁因直言为李陵辩护而受到宫刑，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文人在逆境的磨砺下发愤著述，成为中国文学悲剧性的突出特点。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都是文人创作源动力的最好注脚，杜甫历经安史之乱，深感乱世的痛苦民众的悲哀，用诗句记载下这段难忘的历史，其诗作被称为“诗史”，试看其《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

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索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
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类似的还有蔡琰的《悲愤诗》，以及范成大、陆游的诗歌。

元代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现象，蒙古统治者制定种族歧视的等级政策，排斥汉人入仕特别是进入朝廷，汉族知识分子被压在社会底层，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反映市民生活的戏曲繁荣起来，反映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作品多了起来。关汉卿以城市底层的贫民、妓女、自由职业者为主要描写对象，创作了《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戏剧作品。

《窦娥冤》中女主人的悲剧命运，是最具震撼力和典型主义的，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的所造成的；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窦娥本不想和现实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她拒绝被恶霸张驴儿霸占后受到的诬陷，本希望官府主持公道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谁知官府里更加黑暗污浊，太守姚机滥用酷刑，将无辜的窦娥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为使蔡婆婆免受毒打，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戮。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面对必死的结局，她满腔怒火和怨气，她叫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并且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敬示。关汉卿写窦娥发誓

后，浮云蔽日，阴风怒号，白雪纷飞，这一片浓重的悲剧气氛，把窦娥含冤负屈悲愤莫名的情绪推向极限。很明显，通过这惊天动地的描写，关汉卿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和理的社会而抗争。

最能体现中国文学悲剧情神的扛鼎之作是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旷世巨著，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成了“红学”家们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作者曹雪芹由“锦衣玉食”、“礼义之家”到“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使他深切体会着人生的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偏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红楼梦》的创作之中。

《红楼梦》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前五回为全书总纲，以宝玉的来历为中心扼要地介绍了天上的太虚幻境和尘世的荣宁两府，《好了歌》、“护官符”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即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大观园的毁灭、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悲剧、贾宝玉和人生悲剧。作家的寓意和人物的命运巧妙地隐伏其中。宝、黛、钗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悲剧。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宝、黛虽诅咒批判，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看不到也找不到新的出路。因此，流泪、出家甚至为情而死，成了他们人生路上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而宝钗把自己精心打造成淑女的形象，却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作者通过宝钗的形象，不仅反衬出宝、黛的叛逆性格和他们真挚爱情的可贵，也深刻揭示出宝、黛爱情悲剧的根源。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锋塔的倒掉》）。《红楼梦》描写了包括这个贵族大家

庭的衰亡而没落。就是由女儿所维系的唯一净土——大观园也不能为现实世界所容。所以《红楼梦》终究是梦，它给世人留下对美的事物的执着怀想和意味深长的感动。

总之，中国文学的悲剧性是几千年的剥削独裁制度造成的，这种独裁制度残酷地压迫和抑制人的天性和民主的发展，正象鲁迅说的“吃人”的历史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过地火在运动，在不断的喷突，无数的志士仁人以文学作为武器，不断发出“呐喊”，演绎着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直至胜利的历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精神已经和将会使文学的美丽、善良和真诚在摧残和压抑中不断延续下去。

二、与政治紧密相连

这里所说的政治，主要讲的是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管制及由此造成的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自古以来都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大变革，带来思想文化的大解放，由此带来我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涌现了《诗经》、《楚辞》等优美诗歌和《左传》、《庄子》等优秀散文，秦王朝苛政导致文学的发展进入短暂的低谷，而汉朝盛世把汉赋的创作推向高潮，主要与汉代帝王和贵族的喜爱和倡导分不开。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修养的标志。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学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刘武待他们如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的文人还有羊胜、乔加、公孙诡、韩安国等。

“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 82 篇，淮南王群臣赋 44 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或为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为辞赋，但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延续，许多文人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统治者的提倡和爱好使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如曹魏集团在忧患中的慷慨任气，关注民生形成了建安风骨，魏晋文学由于司马氏残酷杀戮、排斥异己，在文人中造成的朝不虑夕、战战兢兢的正始之音，齐梁陈君主追求享受和感官刺激以女性为描写对象而形成的宫体诗。反映出帝王政治对文学走向的影响。

唐代由于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兼收并容，一视华夷，为士人提供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唐代文学充满了积极进取、奋发昂扬的情调，产生了李白、杜甫这样傲视群雄的伟大诗人。而宋太祖学文抑武的政策，使宋代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文以载道”的思想在

宋代文坛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唐代杜甫、白居易以摹写民生疾苦而闻名，韩愈、柳宗元则以反映时事政治而著称。由于宋国力不如汉、唐强盛，像李白、杜甫那样自诩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情壮志，在宋人诗文中是非常罕见的。而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都得以弘扬：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把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元代统治者对汉人的排斥和对文学的压迫使大批文人深入社会底层，而城市经济的兴起，使他们多出入勾栏瓦肆，进行市民喜闻乐见的杂剧和散曲的创作。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出现，反映出文学作品在崇尚酣畅雄健有阳刚之美时，也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明代统治者对待文学的喜爱，使小说、戏曲创作繁荣昌盛，《西游记》、《金瓶梅》同稍前的两部长篇小说，并称明代“四大奇书”，标志着章回小说也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明清之变的变革引起一批思想敏锐的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抛弃了晚明文学表现自我、个性解放、率真浅俗的理论观念。认为诗要“为时”、“为事”而作。《长恨歌》和《桃花扇》两部传奇杰作都表现了深沉的历史反思，清代文人这种善于思考的特征，使文学更加异彩纷呈，一方面是元明以来新兴的小说戏曲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元明以来已呈弱势的诗、古文，乃至已衰落的词、骈文，入清以后又重新振兴起来。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绪论中说：“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